

# 1736—1911 年间山西粮价变动趋势研究<sup>\*</sup>

## ——以货币为中心的考察

马国英

**内容提要:**在影响粮价的几种因素中,货币由于是价格的表现手段,其制度变革及流量的变化等对粮价的影响更为直接。文章对山西 1736—1911 年间以银计量粮价的整体特征,以及考虑货币变革因素后,以钱计量价格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山西市场上货币实际流量与存量的数值,所以在将以银衡量的价格转变为以钱计量的价格时,将银钱比价和货币铸造的变化纳入考量。研究发现,清代山西省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态势,但是考虑到清朝后期通货紧缩,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实际上要比数据中显示的大。银钱兑换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政府通过制钱的铸造及贬值来调节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变动,维持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相对的稳定。后期随着货币制度的紊乱,大钱、宝钞的发行扰乱了市场交易,对民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 山西 粮价 货币

粮食价格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清代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粮价奏报制度,随着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所藏粮价资料的整理出版,跨度近 200 年的时段内价格如何变化,以及背后所反映的经济社会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粮价变化趋势是通过数据能够得到的最直观的认识,价格的高低涨落不仅反映了粮食供求形势、贸易格局等的发展,而且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农业之于民生的影响。虽然粮价单中的价格数据以银来计量,但由于当时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而货币作为价格的载体,其制度的变革及银钱比价的变化会对粮价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加上百姓买粮习惯使用铜钱,将官方奏报体系中以银计量的粮价转化为以钱计量的价格,可能会反映出与以往清代粮价研究中以银为单位进行考量时不同的特点,与民生的关系也更为贴近。

### 一、文献回顾

以银来衡量,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清代粮价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同时期西欧粮价相比变化幅度较小。<sup>①</sup>其中,李明珠认为直隶省如果物价指数以 1738 年为基期,18 世纪末小麦价格指数上涨到了 151.4,粟米价格指数上涨到了 128。截止到 1911 年,小麦上涨到了 313.5,粟米上涨到了 253.6。但如果忽略清末严重通胀这一因素,粮价的总体变动趋势则更为平缓。<sup>②</sup>王业键计算出 1700—1820 年期间稻米价格年增长率为 0.70%,1750—1800 年期间增长了 50%,1700—1800 年期间

[作者简介] 马国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836,邮箱:mg513@163.com。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4CZS054),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号:2014M550111)的资助。

① Abel, Wilhelm,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 by Olive Ordi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p. 197-199.

②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3-142.

增长了125%。<sup>①</sup> 陆满平认为,康熙、雍正朝粮价较长期维持低贱稳定的局面,乾隆朝以后粮价整体上涨,乾隆到光绪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是渐进的,同时也出现过粮价回落的现象。<sup>②</sup> 彭信威则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来说明清代粮食价格的变化情况,他认为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平均每百年米价上涨55%。<sup>③</sup>

如果将当时复杂的货币制度也纳入考量,有学者认为在当时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下,铜银兑换比率和粮价呈反向关系,<sup>④</sup>一些学者指出19世纪早期用银表示的商品价格比较稳定,用铜钱表示的价格比用白银表示的更易波动,同时这种货币制度使得粮食价格变化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要比以单一货币计量的情况复杂。<sup>⑤</sup> 有学者认为,“白银和铜钱完全不能相互替代”,存在双重的价格体系,粮价影响银钱比,而不是反向的关系。<sup>⑥</sup> 有学者认为,米价与银钱比价的二三十年波动存在近似线性的关系。<sup>⑦</sup> 也对当时虽然政策上倾向与保持二者比价的稳定,但是受铜材供给、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影响,银钱比价不仅在不同的时点存在差异,而且同一时点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有学者对于“丁戊奇荒”前后山西银钱比价的变动进行了分析,将地域性的银钱比价与全国的金融波动联系起来。<sup>⑧</sup>

由于特定地域较为连续的银钱比价数据较为缺乏,所以虽然以银计量的粮价数据较为连续,但是将其换算成以制钱为单位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在已有的文献中,多使用全国性的数据来大体上测度某一地域以钱计量价格的变化情况。本文对1736—1911年间山西粮价变化特征进行研究,对以银计量、以钱计量的情况分别进行说明,同时考虑货币制度的变化对于粮食价格所产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山西市场上货币实际流量与存量的数值较为缺乏,银钱比价数据也不连续,所以本文将结合户科题本、朱批奏折中银钱比价、货币铸造情况和货币制度的等变化进行说明。

## 二、以银计量粮价的变动特征

山西的粮价奏报制度到乾隆朝发展成为包括小麦、小米、高粱、豌豆、荞麦五种粮食价格在内的较为规范的奏报体系。山西北部粮食作物以小米为主,南部以小麦为主,不同的种植结构与饮食结构可能会使这两种作物的价格存在差异,但是从图1中的变化趋势,以及每五年价格的平均值可以发现,二者变动趋势大体类似。另外,鉴于农民种植小麦主要用来交换较为劣质的粮食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小米主要用来食用,小麦在粮食市场中可能更具有代表性。再加上为考查其他省份粮价的变动特征,本文主要选择小麦价格进行分析。<sup>⑨</sup>

当时上报的粮价单中包括每个粮食品种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以及与上月相比的增减情况。本文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阴历月份的粮价数据进行处理,把头一年阴历十二月到次年十一月每个粮食

① Wang Yeh-chie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 – 1935,” in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5 – 68. Wang Yeh-chien, “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1),”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5, No. 2, 1972, pp. 351 – 354.

② 陆满平:《中国价格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9页。

④ Chen, Chau-nan, “Fluctuation of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 1700 – 1850: A Preliminary Survey”, Nankang,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Economic Papers, Selected Series*, Vol. 2, No. 3, 1968, pp. 20 – 30.

⑤ Li L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 – 1990s*,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3 – 142.

⑥ Chen, Chau-nan, “Fluctuation of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 1700 – 1850: A Preliminary Survey”, Nankang,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Economic Papers, Selected Series*, Vol. 2, No. 3, 1968, pp. 20 – 30.

⑦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⑧ 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第79—92页。

⑨ 荞麦、高粱、豌豆这三种作物价格基本上遵循与小麦、小米类似的变动趋势,且同一时期五种粮食的价格基本上由高到低分别为小麦、小米、豌豆、高粱、荞麦(高粱和荞麦的价格基本接近)。

品种的最高价与最低价分别进行了算术平均,求得各自的年均价,之后对最高价与最低价进行了平均,得到以银计量小麦的年均价。本文所使用的粮价数据来源除有特别说明外主要有两种,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的为本人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中抄录的一手资料,道光至宣统年间(1821—1911)的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数据。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 1736—1911 年间的粮价奏报体系中数据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 1820 年之后的数据,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山西部分州府在这一时期数据质量明显不如前期,但与此同时,不同州府之间价格的变化存在一致性,且与方志中相关记载进行对照发现,灾害前后价格的变化趋势也基本可信。另外,在与同期直隶省粮价进行对照后发现,二者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图 1)。而直隶省由于处于京畿地区,其数据质量一般认为相对较高。由于本文考虑全省年度价格的变化特征,只做趋势研究而不考虑更多的细节,所以仍旧采用了这些年份的数据。

总体而言,以银来计量,山西粮食价格在 1736—1911 年间上升幅度并不大。1736—1795 年间山西粮价水平较低,由 1.5 两/石左右的水平上升到 2 两/石左右,大多数年份不超过 2 两/石,不少年份不足 1.5 两/石。嘉庆朝(1796—1820)开始几年小麦价格是下降的,从 1800 年开始上升,之后有所回落。但是,整体而言这二十五年间粮价也处于上升态势,由稍低于 2 两/石上升到 2.5 两/石左右。道光、咸丰两朝(1821—1861)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道光朝中期价格水平较前期有所上升,但是到后期下降趋势明显。到咸丰朝时,虽然最后几年价格有所回升,但整体上小麦价格均处于 2 两/石的水平之下,尤其在 1854—1857 年间,小麦价格水平处于历史最低。同治朝小麦价格水平有所回升,光绪朝(1875—1908)除了 1877—1879、1900—1903 年外,小麦价格整体水平平均低于嘉庆、道光朝的水平,甚至不少年份低于同治朝的水平。但是就整个光绪朝而言,不考虑价格骤然上涨的几个时段,整体上后期粮食价格水平要高于该朝前期和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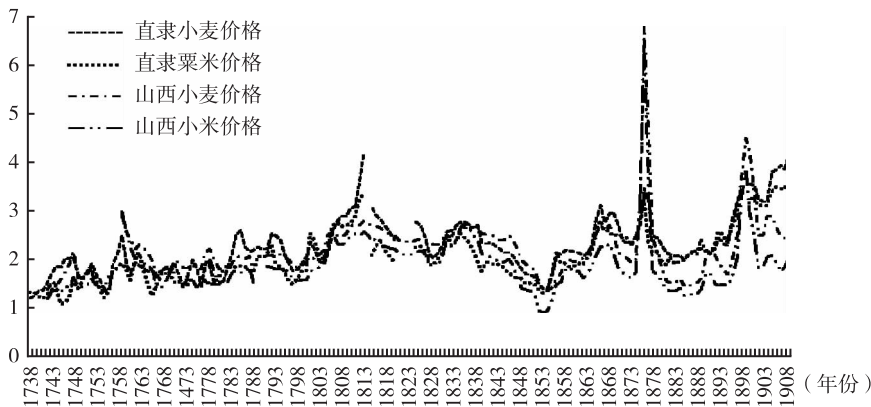


图 1 1738—1911 年间山西粮价变化趋势及与直隶省的比较

山西省小麦价格长期上升趋势似乎是不规则变动的,没有规律可循,但实际上每百年间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平均分摊的,其中波折很大,这一点可以从每五年的平均值(图 2)中看出来。乾隆朝初期小麦价格较低,慢慢开始上涨,1756—1765 年间受旱灾的影响较大,加剧了小麦价格的上涨趋势,之后开始下降,稳定了 40 年后又开始上涨,以较高的价格延续了 40 年左右的时间。1836—1845 年这个时段后,受白银不足的影响,以银计量的小麦价格下降,一直延续到 1856—1865 年。

之后,随着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实施以及国内白银供给量的增加,小麦价格又开始上涨,此次价格的上涨还受到一次涉及面积较广,影响较为深远的大旱灾(“丁戊奇荒”)的影响。旱灾过后粮食生产遭到了较大的破坏,人口亡失严重,粮食的供需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之后生产逐渐开始恢复,小麦价格也回落了。1896—1905 年间粮价又有所上涨,与发生在 1900 年左右基本涉及全省各地的旱

灾有一定的关系,旱灾过后价格又有所回落。

从图1来看,山西省粮食价格与华北另外一个重要的省份——直隶相比较,二者存在较强的相似性,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遵循较为类似的变化趋势,且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价格水平相当。但是到了清朝后期,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份外,直隶小麦价格远高于山西的情况。另外,清代后期直隶小麦价格上涨趋势明显,持续走高,但山西省小麦价格虽整体上呈现出上涨的态势,但部分年份价格低于之前几个朝代的水平。从图2来看,直隶与山西两省小麦价格每五年的平均水平一般高于甘肃、河南、陕西,但是从1850年后开始,两省价格的差异增大,到光绪朝后期,除了庚子之乱(1900年左右)时小麦价格突然上涨外,其余时间均较低,且波动加剧。清朝后期,直隶与河南体现出较强的相似性,而山西与甘肃小麦价格的变动趋势也有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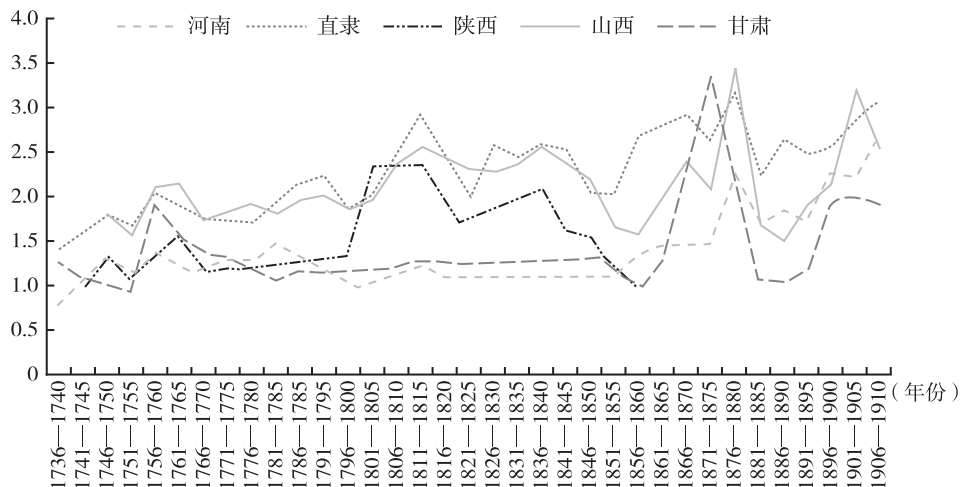


图2 山西与其他省份小麦价格比较图

资料来源:由王业键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 三、以钱计量粮价的变化特征

虽然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本位制度,但白银主要用于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等,铜钱基本用于民间零星交易。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但却对制钱有较强的控制,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国外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及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sup>①</sup> 白银一来价值比较高,二来成色存在较大的差异,称量、换算极不方便,所以虽然粮食价格的奏报以白银来计量,但是民间的日常交易却是以制钱为主。<sup>②</sup> 史料记载,“晋省山路崎岖,铜铅来路甚远,挽运维艰,价值昂贵,……且市厘行使向系制钱……”,<sup>③</sup>将山西粮价奏报制度中的价格数值以制钱来进行衡量,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价格变化的全貌,与民生也更为贴近。

由于缺少市面上制钱实际流量的数据,而当时货币铸造作为政府调节货币流量的一种措施,其变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否有余或者不足,银钱比价也能够反映出用以粮食交易货币的变化情况,由于“晋省四面俱属陆路,不通舟楫。捆运累重,外来钱文甚少”,<sup>④</sup>所以,所以

①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 - 199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3 - 142.

②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105页。

③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山西巡抚蒋兆奎奏请暂减一炉仍留五座鼓铸钱文以平钱价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43-030(以下文中档案均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批奏折,不再一一说明)。

④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山西巡抚蒋兆奎奏请暂减一炉仍留五座鼓铸钱文以平钱价事,档号04-01-35-1343-030。

本部分着重考查山西本地铸造制钱的变动及银钱比价的变化与粮食价格的关系。同时,也综合考虑当时,尤其是晚清时期货币制度的变化情况。

(一)乾隆朝银贱钱贵阶段以钱计量粮价的变化情况

山西宝晋局铸钱是市场上制钱主要来源,但是山西本地不出产铸钱原料,再加上一方面距离铜铅产地较远,另一方面山路崎岖,运输困难,所以在乾隆朝全国制钱较为缺乏的情况之下,山西制钱不足现象尤为严重。乾隆朝初期,官运铜铅铸造制钱存在诸多困难,乾隆批示招商承办,<sup>①</sup>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开十炉铸造,每年铸造新钱 37 200 多串,十八年(1753)减炉四座,每年铸新钱 22 300 余串。二十三年(1758)因钱价未平,添炉五座共十一座,每年铸新钱四万九百多串。铸造出来的制钱除了每年搭放三分兵饷需钱 15 200 余串外,其余的用于平市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司库积存未易钱一万六千余串,因累计的平市价之钱过多,奏准多搭放兵饷,每年剩余钱五千七百余串用来平市价。三十七年(1772)时由于钱价平减,奏准只开六炉铸钱。乾隆朝后期钱价平减,市面上小钱流通,再加上司库积累的制钱一万九百多串,山西巡抚奏请减炉铸造。

表 1 乾隆朝银钱比价的变化

| 时期     | 银钱比价                    | 时期     | 银钱比价  |
|--------|-------------------------|--------|---|
| 乾隆六年   | 810—890                 | 乾隆三十九年 | 995   |
| 乾隆十六年  | 781(省城)                 | 乾隆四十年  | 995   |
| 乾隆十八年  | 798—840(南部),820—870(北部) | 乾隆四十二年 | 995   |
| 乾隆二十一年 | 870                     | 乾隆四十三年 | 974—995   |
| 乾隆二十三年 | 851                     | 乾隆四十四年 | 913—946   |
| 乾隆二十四年 | 807                     | 乾隆四十六年 | 968   |
| 乾隆二十五年 | 800—807                 | 乾隆五十二年 | 984.03  |
| 乾隆二十六年 | 858                     | 乾隆五十七年 | 984.01  |
| 乾隆二十七年 | 872                     | 乾隆五十九年 | 1 000(省城),910—1 180(外州县,较少),<br>1 000—1 100(外州县,较多) |
| 乾隆三十七年 | 978                     | 乾隆六十年  | 省城 1 000(库平),980(市平)                                |
| 乾隆三十八年 | 995                     |        |   |

资料来源: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奏请酌定照时价折收钱文事,档号 03-0769-028;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护理山西巡抚朱一荑奏请出易晋省鼓铸存贮钱文事,档号 04-01-35-1246-003;乾隆十八年四月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琛奏复钱价昂贵令富户将钱报官出易民间交易银钱等事,档号 03-0771-033;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山西巡抚明德题报宝晋局自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起到二十二年正月止铸造钱文并用过铜铅点锡工料各数目事,档号 02-01-04-15061-001;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山西巡抚塔永宁题请核销宝晋局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至乾隆二十四年正月鼓铸钱文用过工料银两铸出钱文数目事,档号 02-01-04-15203-002;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山西巡抚鄂弼题请核销晋省乾隆二十四年一月以后一年加炉鼓铸钱文用过铜铅等项银两事,档号 02-01-04-15284-017;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山西巡抚鄂弼题报山西乾隆二十五年加炉鼓铸钱文用过铜铅点锡工料数目事,档号 02-01-04-15369-002;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鄂弼奏为晋省宝晋局上年正月至本年二月加炉鼓铸制钱用过成本银两数目请旨核销事,档号 02-01-04-15454-012;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山西巡抚明德题报晋省上年二月至本年二月添炉铸钱用过工料数目及卖存钱文数目事,档号 02-01-04-15550-013;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署理山西巡抚巴延三题报宝晋局乾隆三十七年鼓铸钱文搭放兵饷设厂平卖运用钱文易存司库银两数目事,档号 02-01-04-16457-012;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三十日署理山西巡抚巴延三题为题报宝晋局鼓铸钱文乾隆三十八年用过铜铅等项及动用钱串数目事,档号 02-01-04-16554-003;乾隆四十年五月三十日署理山西巡抚巴延三题报宝晋局乾隆三十九年份鼓铸钱文用过工料各数目事,档号 02-01-04-16662-006;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巴延三题报宝晋局乾隆四十年一月至来年一月鼓铸钱文支用工本等各项银数事,档号 02-01-04-16781-009;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巴延三题报宝晋局乾隆四十二年份鼓铸钱文及用过铜锡铅斤支放工料等项钱银各数目事,档号 02-01-04-16921-013;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护理山西巡抚谭尚忠题为山西宝晋局乾隆四十三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共铸钱文总数并支扣易存各数事,档号 02-01-04-17055-022;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抚雅德题报山西宝晋局自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至四十五年二月十四,共铸制钱数目事,档号 02-01-04-17148-001;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山西巡抚农起题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二月晋省招商办铜鼓铸钱文动支银两数目事,档号 02-01-04-17295-008;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九日署理山西巡抚明兴题报晋省自上年三月至本年四月鼓铸钱文易平卖支销存司库银两数目事,档号 02-01-04-17493-005;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巡抚蒋兆奎题报省宝晋局上年闰四月至本年五月鼓铸钱文用过铜铅锡等项动支库存银两数目事,档号 02-01-04-17769-022;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山西巡抚蒋兆奎奏请暂减一炉仍留五座鼓铸钱文以平钱价事,档号 04-01-35-1343-030;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蒋兆奎奏请停止宝晋局铸钱事,档号 04-01-35-1347-022。

① 乾隆九年二月初一日山西巡抚阿里衮奏报查明晋省无存贮铜斤及飭查可否鼓铸钱文事,档号 04-01-35-1234-008。

表1列出依据在市场上出巢制钱所得银计算所得的银钱比价,这一时期山西1两银兑换的制钱数一直在变化,乾隆六年(1741)每银一两兑钱不过八百数十文,十二年市价每银一两易制钱自七百八十文至八百一二十文不等,太原省城历来钱价以每银一两换钱七百五六十文为极昂,八百五六十文为极贱。十六年市价七百八十一文,近省州县更觉昂贵。三十六年(1771)省城市平每两易钱九百四十文,而外州县有每两易钱一千四十文者,民间易官钱不能获利为利。<sup>①</sup>乾隆五十九年(1794)省城市价每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一千文以内,州县间有一二处每银一两易钱九百一十文至一千一百八十文,其余自一千文至一千数十文,一千一百文不等。所以乾隆年间总的趋势是钱价下降,1两银兑换的制钱增加,结合以银计量小米、小麦价格水平均有所上升,所以以制钱计量这两种粮食的价格是上涨的。

在日常生活中,制钱在一定的意义上类似商品,人们在市场上从钱店里把大额的银兑换成钱,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在市面上制钱不足,银钱比价发生变化时,为平市价也会售卖制钱(乾隆朝较为多见),通常在夏季的六月到八月,冬季的十二月到正月。<sup>②</sup>李明珠在研究直隶省粮食价格与制钱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铜钱价格和粮食价格同向变动,即当粮食歉收,粮价上涨,铜钱的价格也跟着上扬,原因铜钱被农业部门用于购买粮食,当粮食购买需要较多的铜钱时,铜钱的价格就会上扬。这与上述对山西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756—1759)1两银兑换的制钱在下降,而这几年以银计量的粮价显著上升,四十二年至四十四(1777—1779)年小米、小麦价格均在上升,1两银兑换的制钱数下降。

## (二)银钱关系发生变化后以钱计量粮价的变化特征

银钱的关系,嘉庆朝是一个转折点,以前是银贱钱贵,嘉庆朝始银贵钱贱。但是到咸丰年间钱法大乱,铸造大钱对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到光绪朝,制钱又开始不敷使用,银价下跌。总体而言,这个阶段将银钱比价等因素考虑在内,粮食价格的变化较为复杂。

嘉庆年间导致银贵钱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乾隆朝后期银钱比价基本到了1:1 000的水平而停止铸造,但是嘉庆元年(1796)五月宝晋局继续开六炉进行铸造,留有记载的年份每年铸造制钱超过2万串。<sup>③</sup>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受鸦片贸易的影响,国内白银外流,对市面上银钱比价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时铸造制钱主要用作发放省城三成兵饷,以及在钱贵时出巢,由户科题

①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护理山西巡抚朱珪奏为钱价平贱酌减鼓铸事,档号04-01-30-0481-009。

②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巡抚蒋兆奎题报省宝晋局上年闰四月至本年五月鼓铸钱文用过铜铅锡等项动支库存银两数事,档号02-01-04-17769-022;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蒋兆奎题报宝晋局乾隆五十九年鼓铸用过铜铅锡斤并收存小钱等各款数事,档号02-01-04-17923-007;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九日署理山西巡抚明兴题报晋省自上年三月至本年四月鼓铸钱文易平卖支销存司库银两数事,档号02-01-04-17493-005。

③ 嘉庆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伯麟题报宝晋局嘉庆元年十二月至三年正月配铸铜铅铸出钱文用过工料等项银两数事,档号02-01-04-18113-017;嘉庆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伯麟题为查报晋省宝晋局嘉庆三年正月至四年正月鼓铸钱文用过铜铅支过炉匠役工等项数事,档号02-01-04-18191-004;嘉庆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伯麟题报嘉庆四年正月一年宝晋局鼓铸钱文用过工料等项银数事,档号02-01-04-18267-014;嘉庆六年六月二十日山西巡抚伯麟题请核销嘉庆五年份宝晋局鼓铸钱文印数及用过工料银两事,档号02-01-04-18342-001;嘉庆九年六月初九日山西巡抚伯麟题报晋省宝晋局嘉庆八年至九年铸钱配用铜铅用过工料等支存银钱各数事,档号02-01-04-18522-010;嘉庆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山西巡抚成宁题为题报宝晋局嘉庆十一年鼓铸钱文用过工料等项数事,档号02-01-04-18733-011;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成宁题报宝晋局鼓铸钱文自上年二月至本年共配用铜铅铸出钱文给过工料各数事相符事,档号02-01-04-18825-011;嘉庆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山西巡抚成宁题报宝晋局嘉庆十三年三月起一年内鼓铸钱文开销工料管收除在各银数事,档号02-01-04-19156-005;嘉庆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衡龄题为奏销宝晋局嘉庆十七年份鼓铸钱文事,档号02-01-04-19382-020;嘉庆十九年七月初九日山西巡抚衡龄题报宝晋局嘉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三月铸钱数并支过工匠等饷银各数事,档号02-01-04-19472-018;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衡龄题报宝晋局正炉自嘉庆二十年四月初五日起一年鼓铸钱文用过铜铅工料折耗银数事,档号02-01-04-19640-011;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和舜武题请核销宝晋局嘉庆二十一年四月起一年内鼓铸钱文用过工料银两数事,档号02-01-04-19728-009;嘉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山西巡抚成格题请核销上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宝晋局鼓铸钱文用过铜铅价脚等银事,档号02-01-04-19821-015。

本中的数据看,元年至二十三年(1796—1818)铸造的制钱数量不少,出泉制钱的情况不多。嘉庆二十年(1815)裁减兵额,需要发放的兵饷减少,再加上钱价下降,不需要平抑市场上制钱的价格,藩司奏请减二炉留四炉用于发放兵饷。由于司库积累的制钱过多,铸钱成本较高,道光二年(1822)山西巡抚奏请停止铸钱,兵饷以银支付。<sup>①</sup> 嘉庆朝山西钱价下降,1两银兑换的制钱增加,而当时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整体上在上涨,故以钱计量山西粮食的价格依旧在上涨。

道光朝始山西铸钱不多,道光九年(1829)巡抚徐炘奏请开四炉铸钱获准,道光十一年(1831)由于司库积累制钱过多,市集银价较道光二年(1822)有所上升,巡抚阿勒清阿奏请停止。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银价昂贵,铸钱成本过高,巡抚杨国桢奏请暂缓开铸。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于停铸时间过长,担心钱法崩坏,奏请开四炉铸造。<sup>②</sup> 这一阶段以银计量小麦价格较为稳定,道光二年(1822)为2.29两/石,在道光十三年(1833)前一直保持在2.21—2.31两/石之间,变动幅度较小,道光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33—1841)间,小麦价格超过2.4两/石。道光十七年(1837),小麦价格为2.62两/石,达到道光朝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小幅的回升,但整体上基本处于下降的态势,到道光三十年(1850)达到道光朝的最低值,而这种下降的态势在之后延续了十余年。而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则大体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过程,道光二年(1822)一两银兑换制钱一千一百数十文至一千二百二三十文,道光十八年(1838)为一千六七百文,增长30%左右,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则为一千七八百文至二千数十文,增长60%左右,远远大于小麦价格的增长幅度,故这一阶段小麦价格以钱计量是上涨的。道光朝由于白银的外流使得市面上银的流量减少,与此同时,铸造的制钱也较乾隆、嘉庆朝大为减少,货币的短缺也整体上为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表 2 道光至光绪朝银钱比价的变化

| 时期     | 银钱比价                                 | 时期      | 银钱比价  |
|--------|--------------------------------------|---------|---|
| 道光二年   | 1 110—1 230                          | 光绪三年十月  | 1 300—1 400(省北),1 100(省南)                     |
| 道光十一年  | 1 320—1 330                          | 光绪三年十一月 | 1 125(解州)                                     |
| 道光十六年  | 1 360—1 370                          | 光绪三年十二月 | 1 375—1 500(省北),875—1 250(省南)                 |
| 道光十八年  | 1 600—1 700                          | 光绪四年    | 1 440(晋中),1 181(太原),1 150—1 200(临县)           |
| 道光二十一年 | 1 360—1 370                          | 光绪四年五月  | 1 150—1 230(太原),900—1 000(晋南),1 070—1 090(河东) |
| 道光二十三年 | 1 540—1 550                          | 光绪四年八月  | 1 275(沁州)                                     |
| 道光二十六年 | 1 700—2 100                          | 光绪五年    | 1 050—1 250(平阳),1 200(绛州)                     |
| 咸丰十一年  | 1 457(平遥)                            | 光绪七年    | 1 658(孟县)                                     |
| 同治十年   | 1 830                                | 光绪十五年十月 | 1 531(平遥)                                     |
| 同治十一年  | 1 865                                | 光绪十六年五月 | 1 503(平遥)                                     |
| 光绪元年   | 2 063                                | 光绪十七年五月 | 1 514(平遥)                                     |
| 光绪三年九月 | 1 492(忻州、定襄),<br>1 162(太原),1 100(省南) | 光绪十八年六月 | 1 536(平遥)                                     |

资料来源:道光二年九月初八日山西巡抚邱树棠奏请暂停宝晋局鼓铸钱文以节经费而资调剂事,档号04-01-35-1360-051;道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奏请停宝晋局鼓铸钱文以节糜费事,档号04-01-35-1363-028;道光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申启贤奏请宝晋局缓开炉鼓铸钱文事,档号04-01-35-1365-049;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申启贤奏议严飭各钱铺以现钱交易一案事,档号04-01-35-1366-033;山西巡抚梁粤涵奏报筹议晋省钱局先以四炉开铸钱文事,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档号04-01-35-1367-025;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第79-92页。

以银计量粮价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咸丰朝,但是当时钱法大乱,货币的紊乱对市场交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咸丰三年(1853)铸造当十大钱,四年搭用票钞。<sup>③</sup> 四年(1854)巡抚

① 道光二年九月初八日山西巡抚邱树棠奏请暂停宝晋局鼓铸钱文以节经费而资调剂事,档号04-01-35-1360-051。  
②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山西巡抚梁粤涵奏报筹议晋省钱局先以四炉开铸钱文事,档号04-01-35-1367-025。  
③ 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王庆云奏为暂停宝晋局鼓铸铜钱请酌量试铸铁钱事,档号03-9516-001。



恒春上奏,由于受战争之苦,军费浩繁,之前通行宝钞广铸大钱,劝富户捐输等均存在困难,奏请铸造宝钱,<sup>①</sup>并制定了详细的章程。<sup>②</sup>咸丰六年(1856)山西巡抚王庆云奏请暂停宝晋局鼓铸铜钱,酌量试铸铁钱。<sup>③</sup>钱法的混乱使得大钱贬值,银价上升,1853—1856年间,以银计山西小麦价格渐趋下降,在1856年降到最低。“上年(1856)冬季当十大钱渐形壅滞,民间食用之物价至加倍有余。殆至(1857)正月初八、九日街市贸易概不行使铁钱”<sup>④</sup>,小麦以银计量的价格逐渐开始上升,但是当时商人跨境贩运大钱易银,买空卖空,<sup>⑤</sup>推高了市场上的银价,而大钱、宝钞也使得市面上银、制钱等较为贵重的货币流通量减少。九年(1859),铁钱施行不畅,巡抚奏请因时因地设法疏通。<sup>⑥</sup>当时大部分物价以制钱计算,大钱和钞按市价折合成制钱,规定市场交易以制钱搭大钱,搭几成大钱,物价就上升几成。<sup>⑦</sup>

同治朝铸钱不多,十二年(1873)在停铸多年后重新开始铸造,十三年(1874)停止。光绪十年(1884)购买洋铜试铸一次后,因为经费不足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再未使用洋铜铸造的情况。而这时铸造制钱主要的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维持银钱比价的稳定,增加市场货币供给量也受到了关注,但却并未收到实效。同治十一年(1872)一两银兑换1865文制钱,到光绪元年(1875)则为2063文。在1877—1879年的“丁戊奇荒”期间,银、钱的输入以及政府的举措使得银贵钱贱的现象有所缓解,而当时全国的银钱比价大致为一两银兑换1600文左右的制钱。<sup>⑧</sup>大灾过后,光绪七年(1881)孟县一两银兑换的制钱数即上升到1658文,之后的几年间省南平遥一直保持在1500文以上(表2),这与全国银钱比价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但到了光绪朝中后期,市面上制钱的短缺日趋加重,一两银兑换的制钱减少,这与全国整体趋势大体一致。光绪二十二年(1896)“口外归化等处凡零星用项俱向钱铺拨兑,绝少现钱。近则省城制钱亦甚短缺,各钱铺不敢出票,以致市面不能流通,银价日行减落。”<sup>⑨</sup>虽然试行铸造银元,但是不能通行。在二十五年(1899)开始用库存的铜铅试铸,二十六年(1900)增加一炉共两炉进行铸造,每月得钱两千串,但是库存铜铅为数不多,令各州县收买废铜。<sup>⑩</sup>而到二十八年(1902),“晋省各属制钱日缺,银价日落,市面万分窘迫,钱铺无法周转。”<sup>⑪</sup>山西巡抚奏请设立官银钱局行用票纸并暂停铸造铜钱。<sup>⑫</sup>

虽然缺少光绪朝后几年直至宣统朝山西银钱比价的具体数值,但是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当时虽然钱价有所上升,但是一两银兑换的制钱一般在1200文以上,<sup>⑬</sup>已经偏离了政府意图维持的1:1000的水平,在这一水平上依旧感觉制钱缺乏,说明市面上不管银还是制钱,均已不敷日常交易所需,区别只是哪种更缺乏一些。由于制钱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制钱的缺乏对经济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当时“或银或钱,皆不能周行。……虽有粟农家而价钱太廉,亦不能使钱有余”,<sup>⑭</sup>而市场上却“凡入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sup>⑮</sup>

① 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恒春奏为晋省筹铸宝钱易银以济军需事,档号03-9511-015。

② 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恒春呈拟筹宝钱章程清单,档号03-9511-016。

③ 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王庆云奏为暂停宝晋局鼓铸铜钱请酌量试铸铁钱事,档号03-9516-001。

④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道监察御史赵元模奏请酌定钱法以平物价事,档号03-9517-015。

⑤ 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翁心存奏为山西铁钱渐滞请将率行分成搭用之孟县知县李昌炽交部议以示惩戒事,档号03-9519-073。

⑥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英桂奏为查复晋省铁钱未能畅行请因时因地设法疏通事,档号03-9520-003。

⑦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618页。

⑧ 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第79—92页。

⑨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胡聘之奏陈设立官钱局及拟铸银元缘由事,档号04-01-35-1374-039。

⑩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护理山西巡抚何枢奏为山西省制钱缺乏拟暂开炉试铸以维圜法事,档号03-9536-008。

⑪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暂停鼓铸制钱及设立官银钱局事,档号04-01-35-1376-037。

⑫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山西省拟请设立官银钱局行用票纸并暂停鼓铸铜钱事,档号03-9536-068。

⑬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618页。

⑭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⑮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94页。



## 四、结论

整体而言清代山西省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态势,由于 1736—1737 年奏报形式与后面年份存在差异,奏报制度尚未规范,这可能导致该年的数据与之后的数据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取 1738 年的数据,将其与 1911 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小麦价格上涨 64.11%,小米价格上涨 28.36%,价格上涨幅度并不大。但是考虑到清朝后期市面上货币尤其是银缺乏的情况,虽然粮食以银来计没有大幅的上涨,但是货币的购买力上升,货币升值(主要是银),通货紧缩,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清朝后期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实际上要比数据中显示的大。从当时的粮价奏报制度来看,不少地区是由各州县地方官奏报以钱计量的粮食价格,州府一级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价将其折算成以银计量的价格进行上报,以银计量的价格是理论上的数值,与市场上的实际交易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什么山西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并未有大的增长?从货币制度上来考察,虽然粮价是以白银为单位奏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使用铜钱。中国实行包括铜和银两种金属的平行本位制的货币制度。银锭是官方交易的基础,尤其是在交税和大规模支出的时候,而铜钱通常用于零售交易,民间粮食的交易大多用制钱完成。即银更多成为一种计量单位外,而钱是实际的支付单位,银钱的兑换比率常常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即通过银钱比价来调整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钱这种既作为货币,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商品的媒介,通过对其的铸造及贬值来调节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变动,维持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相对的稳定。

以制钱来衡量,由于乾隆前中期市面上制钱较少,1 两银兑换的制钱少于 1 000 文,嘉庆朝基本能够维持在 1:1 000 的水平,道光朝以后银价增,1 两银兑换的制钱增加,虽然光绪朝 1 两银兑换的制钱数减少,但是整体上兑换比例要高于乾隆朝。所以将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折算成以钱计量的价格,1736 年到 1911 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是上升的。由于民间日常交易用钱,那么这种变动对于百姓而言是不利的。再加上后期在银减少的同时,大钱、宝钞的发行扰乱了市场交易,市面上制钱极为缺乏,钱的购买力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意味着购买一定量的粮食需要支付更多的制钱,这种变动对于民生则产生了更为不利的影响。

清朝后期山西粮价几次非同寻常的下降,在道光朝主要是白银外流,咸丰朝主要是货币制度的紊乱,而光绪朝则是由于市面上制钱流通不畅,影响到银的流通。当时受政局不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将较为优质的货币转为收藏,使其退出流通,也是导致当时货币流通量不足的一个原因。而当时这种情况不独山西有,全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而山西当时由于受到了商业化发展,以及后来商帮衰落的影响,后期汇入本地的货币大量减少,尤其是银,使得以银计量的价格没有直隶的高,但是却高于河南、甘肃。与直隶省相比,山西省交通较为闭塞,且政府政策如仓储、粮食调运等的实施都不及直隶省,在加上山西粮食生产水平较低,乾隆、嘉庆时期山西粮价能够保持与直隶相当的水平,且高于其他省份,其原因值得思索。另外,清代后期山西省粮价上涨幅度不大,粮食价格维持增长的时间也不长,当时粮食生产水平更是显著下降,山西粮食价格能维持这种较为稳定的水平,其相关影响因素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魏明孔)